

## · 学术视野 ·

# 关于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sup>\*</sup>

王 森 向东旭

**[摘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对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和理论问题。数字技术、资本逻辑、新自由主义等因素构成了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内在逻辑。资本扩张打破时空局限向数字空间延伸，大型数字平台、数字巨头和数字化国际垄断联盟已经形成，数字资本全球扩张呈现出垄断与霸权的显著特征。尽管数字资本的全球化发展有积极的一面，但其全球扩张的消极影响更值得重视。伴随着数字帝国的形成，数字殖民扩张、数字鸿沟、数字治理赤字、数字劳动剥削等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要掌握数字资本的运行规律、防止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积极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关键词]** 数字资本 全球扩张 资本逻辑 政治经济学 全球数字治理体系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的到来，数字科技开始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融合，衍生出了新的资本——数字资本，并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图景。特别是在美欧发达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的助推下，少数大型数字平台掌控全球海量数据信息，再凭借算法算力算据的加持，形成了“强者越强、赢家通吃”的数字化市场，并且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数字资本迅速集聚起来并向全球蔓延、扩张。尽管数字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生产要素的作用已得到重视，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容置疑，但是，数字资本全球扩张所带来的新一轮殖民扩张也悄然相随，数字鸿沟、数字治理赤字、数字劳动剥削等问题正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为更好地利用数字资本、消解数字资本的全球垄断和霸权，防止数字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的剥削和压迫，有必要对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这是我们准确把握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生成逻辑、基本特征和消极影响的关键，也是数字经济条件下我国必须有效应对的重大时代课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社会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认知和评价研究”（20BKS171）的阶段性成果。

## 一、联姻与共谋：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生成逻辑

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样态，而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则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结果，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①</sup> 就其生成逻辑而言，数字技术与资本扩张的“联姻”、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新自由主义以及美欧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战略为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前提基础、内在动力、理论支撑和战略保障。

### （一）前提基础：数字技术与资本扩张的联姻

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sup>②</sup>。进入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数字技术打造了一个万物互联的商业世界，引起了现代商业领域的革命，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催生了大型的跨地域、跨时空的数字平台，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现代化生产和再生产的效率，使得社会资源的流动更具活力、更有效率，也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sup>③</sup>。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为资本服务，科学技术“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sup>④</sup>，并且“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sup>⑤</sup>。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不仅成为少数资本家在本国谋取剩余价值的新形式，也成为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工具。数字资本家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通过对数据生产要素的海量挖掘、搜集和占有，建构起以大数据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实现数字技术与资本扩张的“联姻”，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资本生产和再生产、剥削和压迫以及资本循环周转的链条。可以说，在数字技术的强力支撑下，数字资本的扩张逻辑已然形成，并且正悄然控制着整个世界。

### （二）内在动力：资本逻辑成为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内在驱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起根本推动作用的还是资本。一方面，数字资本是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其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72页。

<sup>③</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4页。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sup>⑤</sup>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下“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sup>①</sup>，因此，数字资本亦“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sup>②</sup>。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数字资本不断整合各种要素资源，使之汇聚在自身的统治和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数字资本就“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sup>③</sup>，这种“吮吸”的内在本质促使数字资本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不断演化和成长，以适应数字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展开和实现。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深度融合，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生产要素快速流动、加速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数字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数字资本的生产方式、资本循环和周转速度、资本积累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资本的扩张也超出了时空的限制，在全球打造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诸多领域的规训装置和控制系统。

### （三）学理依据：新自由主义为数字资本全球扩张提供现实环境

作为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早已超出了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范围，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统治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为攫取剩余价值、实现金融垄断资本积累服务。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日益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工具，它的到来意味着阶级矛盾和斗争的不断激化<sup>④</sup>。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思想也在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占领更为广阔的数字空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在全球宣传和推广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且凭借其先天的资本优势和科技优势，表面上积极宣扬数字经济的自由性、开放性、共享性，主张数字经济需要开放的数字环境，拓展有利于本国数字资本家的国际数字空间，其实质则是利用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积累，进而通过数字空间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来形塑“数字资本的全球积累制度，构筑起数字资本逻辑的全球秩序”<sup>⑤</sup>，促使数字资本向外输出达到更大的规模，并最终巩固其在全球数字空间中的霸权地位。美国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等就在分析了美国电信行业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历史后指出，自由化政策被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强加到了世界其他地区，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现实土壤<sup>⑥</sup>。

### （四）战略保障：美欧的数字化发展战略为数字资本全球扩张保驾护航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④ 参见〔美〕约翰·B·福斯特、〔美〕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⑤ 黄静秋、邓伯军：《数字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批判》，《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9期。

⑥ 参见〔美〕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翟秀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7—168页。

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sup>①</sup>。美国作为世界上网络信息技术起步最早、实力最强的国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开始实施以“国家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一系列数字化发展重大战略，抢占科技制高点，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布局全球市场。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新一轮科技产业迭代加速演进，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美国政府敏锐地把云计算、大数据、先进制造、5G、量子通信等作为布局全球数字化发展的前沿技术，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数字技术应用的战略举措，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资本的全球布局。近年来，全球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把重点转向维护其数字技术和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上。例如，美国国务院在 2020 年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中就强调，美国要在数据科学与存储、通信和网络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等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并保持世界领导力和技术话语权<sup>②</sup>。同时，美国还对中国华为、中兴等公司的数字技术产品和高新科技成果运用进行限制、打压和封锁，企图维持其数字科技企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在这一系列战略规划指导下，美国成为全球数字产品输出和数字资本输出最多的国家，拥有全球数字发展规则制定和数字治理的绝对领导权和话语权，收割数字资本对外扩张的垄断利润。欧洲主要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为了在全球数字化发展中抢占市场、尽可能地拥有最大化的竞争优势，也纷纷发布了《欧洲数字化议程》《数字单一市场战略》《欧洲工业数字化计划》《欧盟数据战略》等一系列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战略规划，加大在数字领域的投入力度，为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差距，发达国家普遍成为数字资本输出国，而第三世界国家则普遍成为数字资本输入国。数字资本输出为发达国家带来了超额利润，带动和扩大了数字商品输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空间就会形成控制。

## 二、垄断与霸权：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显著表现和特征

“资本进入网络意在深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sup>③</sup>，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网络技术就一直被资本所操控，成为资本家全球扩张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对数字核心技术的垄断，促进数字化生产的集中及其在全球加速扩张，“巨无霸型”的数字平台、数字企业和数字化技术与产业国际联盟已经形成并占据绝对的领先优势，数字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经济、政治、生活等领域的数字化统治。

### （一）资本扩张延伸到数字空间

“数字技术经过几十年的科技积累和成果转化，重塑了全球产业链，构建了突破时空限制的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205 页。

<sup>②</sup> “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0/National-Strategy-for-CET.pdf>。

<sup>③</sup> [美]丹·席勒：《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吴畅畅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60 页。

全球化虚拟空间，数据、智能、平台等开始成为各国角力的核心要素。”<sup>①</sup>进入数字时代，资本空间生产的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资本通过对土地、劳动、技术、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空间重组，使得数字空间成为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载体和资本增殖的内在张力，原本在工厂内部的“支配逻辑”逐渐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数字殖民逻辑”，劳动剥削也由原来的物理空间扩展到数字空间。

就土地要素而言，资本家借助数字技术操控土地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利用效率，从而更加精准地控制世界各国的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的土地矿产资源，延续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sup>②</sup>。就劳动要素而言，数字劳动者被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体系之下遭受更为残酷的数字剥削。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家将生产领域纳入数字空间，打破了全球劳动生产要素流动的空间壁垒，从而不断强化对全球数字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就技术和知识要素而言，数字资本家通过数字核心技术垄断取得知识技术的绝对主导权，从而操控知识技术的全球流动。比如，美国颁布的《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就旨在为美国半导体的研究和生产提供巨额的政府补贴，着意打压中国等国家的半导体产业发展，确保美国在半导体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地位。就管理要素而言，数字资本家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远程管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扩大了数字资本全球剥削的广度和深度。

## （二）大型数字平台、数字巨头和数字化国际垄断联盟已经形成并占据霸权地位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算法、数据储存与处理、区块链整合分析的数字技术，正在重构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中，大型数字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经济发展而言，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就是平台经济的全球扩张，而“平台经济全球化修复了资本循环的时空链条，正在重塑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方式，影响着一般性生产关系和‘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局部变革”<sup>③</sup>。正如亨利·列斐伏尔（Heri Lefebvre）所说：“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的工具。”<sup>④</sup>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不断结合，数字化生产不断集中，美国出现了微软、苹果、亚马逊、元宇宙（脸书母公司）、脸书、优步等多个全球大型的数字技术公司。在2019年全球大型数字企业综合竞争力10强中，美国独占7强，分别是亚马逊、苹果、微软、谷歌母公司“ALPHABET”、元宇宙、英特尔及费哲金融服务公司<sup>⑤</sup>。它们在资本的操控下凭借其在核心技术、网络效应、交换成本、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推动数据链与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数字巨无霸。为了维护数字巨头的产业优势和垄断全球数字市

① 刘皓琰：《数字帝国主义是如何进行掠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② 参见黄静秋、邓伯军：《数字空间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及其正义重构》，《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

③ 韩文龙：《平台经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及其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④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89页。

⑤ 参见王振、惠志斌主编：《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45—46页。

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发起和组建国际垄断联盟的方式，加速布局数字化产业与技术国际联盟，构筑起严密的封锁新兴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制度规则体系，塑造数字资本扩张的权力逻辑，维护其全球数字霸权地位。

### （三）数字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不断创新并飞速发展，数字资本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垄断：一是国际化的大型数字平台垄断同盟逐渐形成，二是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出现了大量的“过剩数字资本”。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垄断利润，数字资本家凭借数字核心技术垄断，不断突破种种限制向外疯狂扩张，数字资本输出取代了数字产品输出，成为发达国家数字资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式。然而，在数字资本如此高度发达的时代，商品化、资本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并不纯粹通过经济的运行而进行和维持，数字资本全球扩张已完全渗透到政治、文化和社会之中，并通过政治领域来体现。数字巨头凭借其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而拥有地缘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一方面，数字巨头并不只是在物理空间中运作或行使权力，他们有更多的信息、数据和平台资源操控他国的社会舆论，恶意攻击他国政府网站，挑起重大政治事端，打破原有政治权力的障碍，将地缘政治的范围拓展到数字空间，并不断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数字巨头们坚持资本逻辑的老路，在得到政治权力的保护后进而控制政治权力，通过国际运营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数字帝国。比如，“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以及推特等，它们不再只是大的公司，它们已经完全控制了长期以来由国家独享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域”<sup>①</sup>。在文化领域，资本正在学会寄生于文化差别之上，以便从中获取利润<sup>②</sup>。相较于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表现，数字资本输出在文化领域的侵蚀和扩张显得更“顺其自然”，由于大众数字平台和泛娱乐主义的加持，数字资本引导受众热衷于追求和标榜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的精神，使得他们宣扬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sup>③</sup>，进而使数字资本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

## 三、压迫与剥削：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消极影响及其实质

尽管数字技术与资本的联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世界交往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仍然是资本增殖逻辑与权力逻辑的集中体现，它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不断突破全球市场运行规则和法律法规，造成无序的跨界经营和野蛮的对外扩张。在数字资本的对外扩张中，数字帝国逐渐形成，数字资本

<sup>①</sup> Ian Bremmer, “The Technopolar Moment: How Digital Powers Will Reshape the Glob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100, No. 6, 2021.

<sup>②</sup> Yuezhi Zhao and Dan Schiller, “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 *Info*, Vol. 3, No. 2, 2001.

<sup>③</sup> 参见陶文昭：《信息时代资本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统治世界的权力进一步加强。数字资本逻辑不仅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而且还将权力的触角通过时空碎片伸向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带来的数字霸权、数字鸿沟、数字收益分配不公、数字治理赤字等问题层出不穷。

### （一）数字帝国及数字殖民扩张

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哈特（Michael Hardt）与奈格里（Antonio Negri）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吞噬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所有空间，由此形成了一个“至大无外”的“帝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各大数字平台为了维持和扩大自身在全球扩张中的统治地位，在数字资本的操控下疯狂扩张。跨境数据流动不仅带动货物、商品、金融、服务等飞速发展，更是将资本的信息、观念以及思想等传播到世界各地，数字帝国悄然形成，新一轮席卷全球的数字殖民扩张和掠夺也随之到来。

一方面，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使得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深度融合形成数字帝国，数字资本统治世界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在数字帝国的统治之下，数字资本家通过对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掌控，不断以数据霸权、平台垄断以及制造需求等多种方式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数字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数字帝国的形成使得数字殖民和数字资本积累显得更加轻而易举。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sup>①</sup>为了获取超额垄断利润，数字资本在数字技术的强大支撑下借助数字平台不断与金融资本融合形成数字巨头，从而掀起新一轮的数据圈地运动，进而不断对数据进行无限循环地占有、攫取、开发、利用，最终拓展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打造属于自己霸权统治的数字空间，完成对广大数字劳动者的数字殖民和数字资本积累。

### （二）数字收益分配不公等问题突出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sup>②</sup>资本的价值增值与资本支配劳动和社会的权力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数字资本也不例外。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数字帝国主义新的殖民方式——数字殖民，加剧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进而导致数字收益分配不公、数字鸿沟和数字治理赤字等一系列问题。

其一，数字收益分配更加不公。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一般数据和数字平台的绝对掌控决定了数字资本家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而广大数字劳动者只能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数字资本家必然是数字分配的最大受益者，数字劳动者作为被剥削的对象，只能在资本压迫下被动从事数字劳动，还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其二，全球数字鸿沟不断拉大。“信息革命还加剧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与较量，加强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和控制。”<sup>③</sup>数字化进程并没有化解数字鸿沟，反而逐渐拉大了数字鸿沟。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

<sup>①</sup>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sup>③</sup> 罗文东：《信息革命对社会主义造成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5期。

家在数字核心技术研发、人才支撑、创新转化等多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和话语权，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历史、现实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基本丧失了在数字领域发展的主动权，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拉大。其三，数字治理赤字愈发严重。尽管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数字核心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快速崛起，数据流量激增，当前很多国家在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化治理体系以及数字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和瓶颈，在应对本国乃至全球数字治理方面的难题时仍举步维艰，全球数字治理赤字突出。隐私保护、人工智能、跨国平台、数字贸易等领域的治理问题和治理需求层出不穷。数字技术发展、国际格局变动、新冠疫情持续加剧了国家间利益失衡，全球数字规则的演进方向更加复杂<sup>①</sup>。

### （三）数字剥削和压迫更加严重

“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sup>②</sup> “以无线技术为基础的移动私人化发展背后，是变化中的社会经验和工薪劳动。”<sup>③</sup> 由于数字技术不受时空限制，因此，数字技术越发展，跨国信息交流共享和跨国资本主义就越发达，数字资本扩张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就越严重。一方面，数字资本家凭借数字核心技术牢牢掌握着一般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此来强化“中心—外围”的数字资本全球积累结构<sup>④</sup>，并借助数字技术连接不同地区和产业形成新型的结构性关系，使数字化时代的社会生产完全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由此，数字资本家在全球范围内掌握了对数字劳动者的绝对操控权，通过“中心—外围”的方式进行数字劳动剥削，进而不断榨取落后国家及地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借助于“数字平台的技术垄断性造成数字劳资关系的不平等，并深化了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者的全面控制和剥夺”<sup>⑤</sup>。数字技术与资本“联姻”后，数字技术放大了资本的支配权力，成为数字资本夺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利刃，不仅在数字劳动者身体上加重劳动强度，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弱化甚至消解数字劳动者的反抗意识，最终导致数字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性更强，而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则不断强化。

## 四、规制与治理：我国应对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实践

尽管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数字剥削和压迫，但是，在全球数字经济高

<sup>①</sup>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治理白皮书（2020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12/P02021122338085909153.pdf>。

<sup>②</sup>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sup>③</sup> [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63页。

<sup>④</sup> 参见高海波：《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数字资本全球积累结构的视角》，《经济学家》2021年第1期。

<sup>⑤</sup> 温旭：《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

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数字资本绝不能完全拒斥，必须在充分认识和利用数字资本的特性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坚持规范和发展并举的总体思路，有效地对数字资本进行规制和治理、防止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进而发挥数字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利用数字资本在提升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规范资本市场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数字大国，应更加自觉地利用数字资本的发展成果，规范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更好地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促进数字文明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

### （一）规范和引导我国数字资本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生产要素，在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已深度融嵌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数字资本的运行规律是我国数字经济提质增效、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具体而言，我们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和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坚持数字资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并重，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统一，坚持效率和公平相统一，坚持数字发展为了人民、数字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要充分发挥数字资本发展的最大化社会效益，不仅要利用数字资本在带动和整合各类生产要素、提升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还要着力发挥数字资本增强社会生产协调性、变革劳动模式、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数字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的积极成果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确保我国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如此，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国家主导下的数字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的消极影响，利用好数字资本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带来的文明成果，规范我国数字资本市场，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更加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 （二）防止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

随着西方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某些数字平台在超额利润的驱使下为提高配置效率和节省成本，开始根据自身的需求随意支配市场。平台“二选一”、算法监控、误导性消费、大数据杀熟、捆绑交易以及价格歧视等一系列垄断行为日渐增多，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国外，防止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以及平台反垄断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机构和部门并进行反垄断调查，以促进本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毫无疑问，在数字资本的疯狂扩张中，中国数字平台的发展必然受到重大影响。随着国内数字平台规模日益强大，部分平台也呈现出价格歧视、算法监控、“二选一”等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一些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造成了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扰乱了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数字经济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的初衷。因此，“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

有些资本野蛮生长”“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sup>①</sup>以及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势在必行。同时，我们应该明晰，强化平台反垄断监管，防止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并不是不要数字资本，而是要引导数字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健康、有序地发展。

### （三）促进数字文明成果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要“加强形势研判，抓住机遇，赢得主动”，要“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sup>②</sup>。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使得广大数字劳动者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为严重，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成熟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数字资本家与数字劳动者之间更加对立。因此，切实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迫切需要我国为全球数字化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其一，必须扬弃数字技术的理性统摄，摆脱数字技术工具理性的桎梏和数字劳动控制的“全景监狱”牢笼，坚持数字技术发展应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本立场和价值需求，使数字技术创新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其二，要摒弃冷战思维，戳穿数字自由的谎言，反对数字霸权和垄断，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推动构建双边、多边合作与治理的机制，努力化解数字治理赤字、弥合数字鸿沟，消除数字分配不公，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其三，加强数字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攻克数字核心技术难关，将关键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数字技术产品和智能化服务。其四，不断激发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拉动生产力发展，促进创新增长，点燃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③</sup>。

（王森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向东旭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文 志]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11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38—539页。

③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62页。